

同一屋檐下的租客 ——我在坦桑尼亚的女同事

高良敏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地区为坦桑尼亚及其周边国家

2016年2月5日，二房东内玛说一个叫朱玛尼的女孩要来租另一个房间。在2月6日傍晚，我在院子里见到了朱玛尼，个头硬朗，精神面貌佳。她正提着一个小箱子，背着大包往屋子走来。我简单跟她打了个招呼后，她便进入了所租的房间。2月7日早上8点，由于我需早早到医院，没有与她过多交流，直到下午6点，我在院子的书桌上整理田野笔记时，和她才有了正式交流。经过大致两周的交流，我得知她今年27岁，出生于坦桑尼亚南部地区，本科毕业于坦桑尼亚最好的穆希比利医科大学（Muhimbili University of Health and Allied Sciences, MUHAS），现就职于依法卡拉健康研究所（Ifakala Health Institute, IHI）。她不同于游离在家庭、宗教、女儿和“哥哥”之间的二房东内玛，也不同于少部分在医院艾滋病关怀与诊疗中心工作的来自上层家庭的志愿者，以及热心朴实的同伴教育员，她有自己的事业和独特而矜持的情感观。

殊不知，处于懵懂青春期的她，虽然也曾遭受过部分当地农村女孩经历过的遭遇，但却涅槃重生了，走出一条自己

的道路。在充斥着男权的社会文化场域之下，实属难得。



图 1 2016 年 2 月，我邀请朱玛尼和门卫共进晚餐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她眼中的男性

平时有空，我和朱玛尼就会谈及各种话题。言语中，她对未来事业、生活充满信心，与我碰到的很多当地女性不同，可谓“新时代”女性。

之所以“新”，是源于她懵懂青春期的坎坷经历及由此埋下的对抗男性、男权的种子。在初中二年级 15 岁时，她结交过一个男朋友，按照她的话说就是有钱的“糖爹爹”。在一年后，她被男朋友抛弃，因孕有一女，被赶出学校。幸运的是，她在母亲的鼓励和陪伴下，一步步走出了与无数当地农村女孩不同之路。她妈妈不仅坚持要她把孩子生下来，还得去继续上学、读大学，找更好的工作赚钱养孩子。对于

痛心往事，她表示自己非常恨之前的男人（朋友），她认为后者没有任何责任感！当然，朱玛尼知道在坦桑很多男性都缺乏责任感，不会照顾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也不愿意为整个家庭付出，只是在家庭有钱或者是好的时候出现，一旦出现困难，就会逃避责任，离开妻子和孩子。她用一番坚定而有力的话语，倾述着痛苦和辛酸的过往。她接着说：

“坦桑政府对男人太宽松了，应该让他们在法律上承担更多的责任，而不应继续放任他们！我之前的那个男朋友就是这样的人，完全没有责任感，有了孩子之后就跑了，甚至根本不承认这个孩子是他的，这令我很伤心。好在，我有一个开明的妈妈。”

我回应她说：“是的，我在医院艾滋病诊疗中心也看到很多单身女子，她们很坚强很努力地在家干活，也有很多孩子都找不到谁是自己的亲生爸爸。”对此，她点了点头：

“在坦桑，这是非常常见的事情，这种形式的婚姻完全是非正式婚姻，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不过这也是很多地方习俗完全藐视女性在婚姻中的权利导致的结果，男性的责任完全为零。其实我知道，像我之前的男朋友，他不止有一个性伙伴，甚至很多。我现在必须忘记他带给我的无尽的痛苦。现在只想专心于事业，努力工作。今后，我也不想结婚，只想把女儿养大，好好培养她。”

她女儿现在巴加莫约的某私立小学上学。与很多当地英语教师较少的公立小学不同，私立小学有很好的英语老师，但每年得花费 1000 多美金的学费、餐费及住宿费。以她现在的收入完全可独立支持女儿上私立小学，她担心的是以后

进入大学和出国读书的费用。也正因此，她一直在努力地工作，增加知识和工作技能。她相信只要努力工作就可以有足够能力来支持女儿读书。



图2 巴加莫约镇上一所公立小学外景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她在埋下对男性厌恶种子的同时，也在控诉着这个男权社会，哪怕是她的父亲。正如她所言：

“坦桑尼亚男权社会是一个普遍、复杂的问题。在很多农村地区，男人都很懒惰，只在丰收的时候待在家里，把农产品卖了就离家出走了。家里的整个负担基本都是女人在支撑。你在很多市场上或者农村里，会见到很多男青年聚集在一起聊天，而妇女们却在农场里劳动。在大街上卖椰子的，基本都是男的，很少有女的，因为女人爬不了椰子树。男的有了钱之后，不是出去找其他女人，就是买酒喝，真是不负责任。”

在谈到她父亲时，朱玛尼也充满种种不满：

“我父亲就是这样的男人，有3个老婆，有很多孩子，在家里不做任何事情，但掌控了整个家庭经济和家庭开支，还经常出去找年轻的女孩子。我读高中是我跟我母亲在乞求他多次之后，他才勉强同意的。我非常痛恨像我父亲这样的人，没有责任感，还拿着所有家里的钱在外面找女人。”

她眼中的母亲

提到母亲，她总是满满的感激和尊敬：

“妈妈在我人生中，非常重要，从小一直支持我、鼓励我。她很清楚地知道，爸爸不会在学业上给予我太多的支持。在我初中怀孕时，妈妈的支持可以说是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是她拯救了我。她通过小生意悄悄积攒起我读书的钱，还经常对我说：‘在坦桑尼亚都是男人的世界，大多数女人除了隐忍，别无它法。如果女人不受男人欺负和压迫，必须保持经济上的独立。作为女孩子，唯一能够摆脱命运的方式就是好好读书。只有读书，你才能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在大城市里生活，那里比农村好。这点对于女孩子来说非常重要。’这些都是妈妈一直鼓励我的话，从小我学习很努力。后来，我犯了错，妈妈并没有怪罪我，她顶住整个家庭的压力，一直在支持我，我很幸运有一个伟大的妈妈。”

高中毕业那年，朱玛尼母亲逝世，对她是一次沉重打击，但母亲早期对她孜孜不倦的教诲，使她拥有一颗坚毅而向上的心。高中学习成绩一向优异的她，被坦桑尼亚最好的医科

大学录取。通过申请国家助学金以及学校奖学金，她最终完成了学业，并顺利在依法卡拉健康研究所找到一份全职工作。在回顾这段历程时，她说：



图3 依法卡拉健康研究所巴加莫约分所临床实验中心一角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我在农村长大，家人都信仰伊斯兰教，按理说家庭很难支持女孩读书。家庭也不富裕，幸好妈妈是个精明的小商人，有自己独特的眼界。她认为我应该去上学，不希望我跟很多农村女孩那样，年纪轻轻就出嫁。在妈妈的鼓励和支持下，我才有了这样的机会，一直读到初中毕业。遗憾的是，在我读高中时，妈妈去世，爸爸、哥哥和姐姐认为我没有必要再读书，希望我嫁人。按照他们的想法，16岁的我可以出嫁了，这样他们也可以获得不菲的彩礼。然而，我选择了抗争，选择了自己打工完成学业，就像妈妈当初告诉我读书才是农村女孩子的唯一出路。最终，我争取到爸爸的支持，才顺利地完成了高中学业。然而，当进入大学时，我面临巨大挑战，去哪里找钱来支持我完成大学5年的学业？那时候，我

的人生进入了另外一个重要抉择时期。家里不可能再支持我，也没有那么大能力。我得想办法解决读书所需的费用。我很幸运，由于学习成绩优异，获得了国家助学金贷款、学校奖学金。我的人生才出现了重大转折。”

对于婚姻

尽管坎坷和不易，但朱玛尼却拥有矜持的婚姻观。工作后，经济上独立的她，对于未来的情感与婚姻充满自信，相信自己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在她眼中，未来的丈夫不能是不负责任、寻求多性伙伴、婚外性行为的男性，必须是有责任感、有爱、彼此独立而相互依赖的“新男性”。这一坚毅的婚姻和情感观，尽显自主和自信。虽然与当下坦桑尼亚大多数人的婚姻观格格不入，但作为新时代的独立女性，她在用自己的行动捍卫自己的未来。在2014年，朱玛尼来到巴加莫约出差三个月期间，她认识了现在的男朋友，一个在CRBD银行巴加莫约分行工作的职员。对于这次新的情感，朱玛尼有很多的期待。

“我想找一个特别的人，不同于很多坦桑尼亚男性的人。这个男人可以和我平等地协商家里的一切事务。同时，这个男人必须有责任感，不仅是对我个人有爱，对家庭也得有爱。这个男人必须和之前的男朋友不同，也不同于我的父亲。我希望，他可以接纳、包容我的过去，毕竟我是有女儿的人。但是我绝对不会逃避过去，过去的一切不幸都是我人生的重要经历。我很感激这段经历，给了我无穷的力量来面对未来。我坚信可以找到

一个负责的、有爱心的男人。这个男人同时也要像我一样保持经济上的独立，经济上不一定依赖对方，但在情感上依赖对方。我现在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可以找到想要的男人。我还年轻，我有时间去等待、去寻找。”

当谈到现在的男朋友时，我问：“他是你想找的人吗？他会成为你未来的丈夫吗？”就此，她的回答充满主见：

“其实我目前还没有一个定论。虽然我们在一起两年了，感情上也很好。但对于他，我还有很多未知。比如他是否还有其他女人？是否也会找其他女人？是否有责任感？这些问题得一个一个解决之后才能做出是否和他结婚的决定。我希望，婚姻是强大而坚固的，不允许在婚姻中出现第二个女人。我还在考察他，一旦发现有不符合的，就会结束我们之间的情感关系。”

我又问：“那你现在的男朋友如何回应你的要求？他是否着急和你结婚？”

“他的年龄和我差不多，已超过坦桑传统上大部分人的结婚年龄。他愿意给我更多时间来考虑结婚问题，也很理解我为什么这样做。我知道他很着急结婚，他的家人、朋友都多次催促过，但他未催促过我。其实，从现在来看，我和他应该可以走到婚姻的殿堂，但还需一些时间来了解对方。”

对于事业

在对抗男权的道路上，像朱玛尼这样的新时代女性，有

自己独立的思考，并未因为点滴经济收入的增加、稳定的工作而被淹没在男权的汪洋大海之中。就朱玛尼个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除了努力工作、不断提升自己专业上的知识和技能外，还在多方寻找处理婚姻、情感上的智慧和经验。她说想出国增长知识，继续开展疾病监测方面的研究。她还告诉我，目前正在积极申请去南非开展短期流行病学培训，也在积极地申请其他国家的培训和硕士项目。我向她推荐了清华大学国际公共卫生硕士项目（International Master for Public health, IMPH）。至于为什么如此喜欢出国培训、学习，她这样回答我：

“我出国学习、培训的目的是为了增强自身的能力，不仅包括知识、眼界，也是为了认知国外的女性如何处理婚姻和情感关系。我相信，每一个国家的女性都有自己的智慧、经验，值得坦桑尼亚女性学习和借鉴。我也知道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文化问题，与当地的文化有重要关系，不一定适合我们，但是我相信，总有值得借鉴和思考的地方。坦桑尼亚社会发展太落后，很多观念依旧保守，男人那么强势，处在弱势地位的女性往往很难逃脱出男权的掌控。这是我希望出国学习的一个重要目的。我在初中时候才开始学习英语，但是一开始我就努力地、认真地学，我知道英语的重要性。后来，我也凭此才在大学学习中获得了医学学士学位和在 IHI 工作的机会。在 IHI 工作期间，研究所有很多外国人，工作语言也是英语，大部分时间都是讲英语。”

第二，在涉及自己专业、工作事务上，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和思考，并不一味地随波逐流。她的专业为公共卫生，对于当地公共卫生系统，她分析的视角不仅局限在表象问题或现实问题上，甚至还有来自政治治理层面的思考。正如她所说：

“坦桑尼亚的公共卫生系统，在村卫生室（dispensary）这一级存在很多问题。不仅医生的服务质量差，医疗设备方面也极其糟糕，很多医务室都没有冰箱，供电不足或电力不稳定。冰箱经常损坏，维修也跟不上。很多大一点的医院都没有救护车，很多村卫生室还在使用救护自行车。如果一个人要进行阑尾炎这样的小手术，一般医院都不接诊，医生除了使劲地开处方，毫无其他办法。要么推荐病人到更高级的省级、国立医院。我认为，这种处理是很荒唐和不可原谅的，这会造成病人的巨大痛苦和医疗资源的极大浪费。这是国家政治治理的问题，坦桑尼亚存在太多医疗腐败、管理不善。腐败不仅在政府层面，还在医生层面。很多医生都会把医院的药、设备偷走或者直接拿去自己的诊所，谋取私利，而非为了人民。相当一部分医生都会将病人推荐到自己的药店或者朋友的药店，而不是开具国家免费提供的药物。另外，在县、省、国家级医院，很多医生都在公立、私立医院兼职，很多病人都被推往私立医院。因为医生会告诉病人，只有那家私立医院才有能治疗的药物。这里医生都非常富有，很多都是早上很晚上班，很早就下班，花更多的时间在私立医院和自己的药店。我认为是政府的问题，因为本身就很腐败，医生、官员是这个腐败链条上

最大的获利者。但政府或者很多人士都不会去反思或改变，因为他们就是其中一员。”

除了公共卫生系统外，她还对坦桑尼亚的医保政策有着独到的理解和认知，经常下农村的她说：

“在农村一级的村卫生室，我认为那就是一个摆设，医生水平很低，根本没有病人，病人都去找传统医学的医生（traditional healer）和巫医去了。但我认为这不是村民健康知识不足、教育程度低下的原因。因为在农村地区，每年政府都会组织村民交钱，购买医疗保险，虽然最终村民们交的钱都由政府统一管理，但事实却并非政府官员说的那样，交了医疗保险，会得到一张医保卡，看病就可以省很多钱。在坦桑尼亚，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因为公立医院中根本没有好的药，医生也不愿意花太多的时间、精力在病人身上。最终的结果是，医疗保险政策完全是失败的，村民根本不相信政府能够为他们的健康努力。因此，很多病人只有在传统医学无法治愈的时候才会到医院，要么是得了艾滋病、结核病这种政府强制管理的疾病，才会到医院。前几天马古富利总统去最好的医院莫希比利国立医院调研时，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很多病人躺在地上，而不是睡在病床上，还有急救车完全无法使用。虽然他出台了一些措施，但是问题依旧存在。我个人认为，坦桑尼亚的医疗、公共健康问题之所以如此糟糕，一是政府治理上的问题，二是腐败的问题，三是整个社会都存在问题，医疗问题仅是其中之一，是系统性的问题。”

第三，她经济独立和努力上进，不仅为了自身，也希望回报那些曾经帮助过自己的女性，同时也为了下一代。2014年，朱玛尼第一次到巴加莫约时，在碰到困难时得到了一个当地女性的无私帮助。她说那个帮助她的女人就像已去世的母亲，现在她也叫她“妈妈”。而为了回馈“妈妈”，她在巴加莫约买了一块地，盖了一间房子，打算开一个商店，交给“妈妈”管理。

“2年前来巴加莫约时，租了她家的房子，一个很小的房间。她经常帮助我，每天上班之前都要说一声：‘你还好吗？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她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一到周末，都会让我去她家吃饭，说我平时工作很累，周末可以好好休息休息。那段时间，在我孤独、困难的时候，都是她帮助我的，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她的丈夫前几天去世了，我这几天有空就会过去看望她，陪她聊聊天。以前，我每次来巴加莫约都去看她。我也叫她‘妈妈’，我在这里买了一小块地，盖了一间房子，明年可以建好，等房子盖好后，我出钱给‘妈妈’开个商店，多余的房间可以出租。那样‘妈妈’以后的生活就有保障了，也算是对她的回报，我也算在这里有一个真正的家。我也可以多一些经济收入，为女儿将来上好大学积攒一些钱。”

结语

因为海边天气炎热，我喜欢在院子里读书、看报、小憩或写田野笔记，尽管傍晚或晚上蚊子特别多，但在身着长衣

长裤，再涂抹上厚厚的风油精或者清凉油后，蚊子也只能干瞪眼。当朱玛尼从研究所回来，她见状，除了好奇和吃惊外，还给我取了个名字“Chinese mosquito”（中国蚊子）。在向我寻求神药之后，她也会将凳子挪到院子里，甚至还会拿出从达累斯萨拉姆带来的披萨跟我一起分享。天马行空般的闲聊成为了我们相处的方式。也正是通过闲聊，我们分享和了解了彼此。记得每次闲聊结束时，她常说：“只要努力，明天会更好！”

在当下之非洲，贫困压力和男权观念仍然盛行，尽管女性抗争仍前路漫漫，但诸如朱玛尼等诸多坦桑尼亚独立女性的个体史无疑让人相信——“只要努力，明天会更好！”



图4 我和房东喜欢在院子的 Neem 树下办公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责任编辑：李宇晴 文字审校：王琴